

精神分析化的辩证法是否仍是唯物主义的？

——对齐泽克哲学的一个方法论考察

王铭浩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6年1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2月27日

摘要

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重构辩证法，将矛盾与否定性从社会历史运动的解释轴线，转向了主体裂隙与象征秩序无法封闭的结构经验，并据此自命为“辩证唯物主义”。争议的焦点不在政治标签，而在于方法论。对象优先性、实践中介与历史结构解释能否在精神分析化语法中保留其决定性地位。围绕“问题域重置 - 唯物主义自我理解 - 历史唯物主义检验”展开辨析，可以看到，这一理论路径在反观念论意义上强化了否定性批判，却容易把现实社会关系降格为裂隙的症候性呈现，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形成可界定的限度。

关键词

齐泽克，拉康，否定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Is the Dialectic of Psychoanalysis Still Materialistic?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of Žižek’s Philosophy

Minghao W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January 24,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4,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7, 2026

Abstract

Žižek reconstructs dialectics through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shifting the explanation of contradiction and negativity from the explanatory axis of socio-historical movement to the structural experience of subjective fissures and the inability of symbolic order to close, thus proclaiming himsel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focus of the controversy is not on political labels, but on methodology.

Can the priority of the object, the medi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structures retain their decisive position in psychoanalytic grammar? Analyzing the process around “resetting the problem domain-materialist self-understanding-historical materialist examin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theoretical path,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ritique of negativity in an anti-idealist sense, easily reduces real social relations to a symptomatic presentation of fissures, thus forming a definable limit in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Žižek, Lacan, Negati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thod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代左翼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辩证法的结合已经不只是某种跨学科的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意识形态运作与主体生成机制的说明，使批判得以进入幻象、症候等层面；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辩证法的对象性、实践性与历史解释功能被重新分配，现实社会关系更容易以裂隙、症候、失败的形式进入理论，从而对唯物主义的内涵出现了一定偏离。这种偏离并非简单的立场转向，其涉及唯物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承诺：对象优先性、实践中介与历史机制解释是否仍然能够作为辩证法的第一原则保留下来。围绕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展开方法论辨析，恰好可以将这一偏离的逻辑清晰呈现。裂隙与否定性如何被推到核心位置，现实对象如何从结构机制转化为界限经验，政治行动如何从实践中介转译为断裂事件；同时也可以据此检验，否定性批判的强化是否以历史解释能力的削弱为代价([1], p. 122)。

2. 辩证法问题域的重置：齐泽克的理论出发点

(一) 矛盾理论重心的转移

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力，首先就在于其对象规定性。矛盾被安置在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具有可追踪的生成机制与历史条件。生产方式、制度组织、劳动过程与阶级关系共同构成矛盾展开的基本场域，辩证法由此成为在历史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而不是抽象逻辑或心灵戏剧。马克思通过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与理性能动性等对立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统一起来，使现实世界具有辩证本性；以这种辩证本性的现实为基础，马克思对辩证法和本体论的前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2], p. 20)。

齐泽克在处理辩证法问题时，将矛盾的理论重心转向主体层面。他所理解的矛盾不再优先被规定为社会关系内部的结构对抗，而被重新界定为主体存在方式中的内在不一致。主体在能指结构中被切开，裂隙不是偶然心理现象，而是主体得以成立的条件；欲望、幻象、驱力把这种裂隙固定为结构性经验，否定性因此获得了持续性([3], p. 120)。裂隙化的主体理论一旦被用作辩证法的基础，矛盾概念的生成路径就会发生替换。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矛盾的生成路径通常通过社会关系的结构机制得到说明。劳动过程、价值增殖、制度安排与阶级分化构成矛盾的现实基础，矛盾的尖锐化与转化也依赖于实践过程的中介结构。主体裂隙的路径则不同。矛盾更像一种先验结构，总以某种不一致的形式先行出现，社

会关系也更容易成为裂隙的外显场域。此时，矛盾的解释重心从“社会关系如何生成对立”转向“秩序为何必然失败”。批判锋芒得以保存，矛盾的历史机制却更难被展开为可追踪的链条。这种转变并没有意味着社会关系在理论中消失，而是改变了其进入方式。社会矛盾更容易被处理为主体裂隙的外在化，成为秩序失败的征兆或症候。辩证法由此更接近对不可同一性的揭示，较少直接承担对社会结构如何生产矛盾、矛盾如何转化为历史运动机制的说明。由社会关系到主体裂隙的转向，构成了后续所有争议的起点。辩证法仍在运作，但它首先回答的是主体与象征秩序的难题，而不是社会结构的生成逻辑。这种重心迁移会直接影响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现实这时就不再首先作为可分析的社会结构进入理论当中，而更像作为无法被整合的剩余进入理论。裂隙不只是主体内部经验，它也被赋予一种现实论地位：现实以其不被符号化的方式逼近主体，以症候形式折返到社会生活。这一解释路径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把意识形态的滞后性与主体的被动性联系起来。但其困难也同样明确，社会结构的规定性被压缩为症候的表面，现实对象的层次差异不再通过结构机制解释，而通过否定性强度来区分。

(二) 精神分析的引入

齐泽克将精神分析置入辩证法的内部结构之中。其中，拉康关于主体的理解，以及象征秩序与实在界的区分，构成其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前提。辩证法不再按照发展过程展开，而是以主体内部的不一致性作为分析起点。裂隙及其回溯性运作成为理论展开的基本线索，差异在最小层面上得到把握。否定性因此不再只是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否定，而被内在化为秩序无法完成自我封闭的条件。精神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辩证法的枢纽，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把否定性固定为结构条件的机制性语言。主体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位置，而不是实体的存在。幻象使主体能够与现实发生关系，驱力则通过重复维持主体内部的裂隙。这种分裂-幻象-驱力的三重结构，构成其主体理论的基本框架，也影响了辩证法对运动问题的处理方式。运动在此不以概念连续展开为线索，而以裂隙的重复及其回溯性规定为特征([3], p. 121)。并且，齐泽克以视差辩证法突出事物内部的最小差异与裂隙，限定了对唯物主义的物质性理解，并把这一限定推进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构型([4], p. 49)。沿着这条思路，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提供的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把现实理解为不可整合性、把主体理解为裂隙位置的理论前提。辩证法因此获得一种新的现实指向，即现实不再作为可被直接把握的对象进入理论，而作为象征秩序的界限、失败与剩余进入理论。

问题也由此产生。如果现实主要以“界限”出现，现实社会关系的结构机制如何被理论化？如果否定性成为普遍结构，历史差异性如何保存？这些不是外部质疑，而是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内在一致性带来的方法论后果。这种理论变更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对象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现实对象进入理论时，首先以界限的方式出现，象征秩序的不可封闭性成为现实性最直接的标志。因此产生了一种倾向：对现实的论证不再以结构机制分析为首要任务，而是以揭示界限为首要任务。当这一逻辑被提升为辩证法的总体形式时，现实对象的规定就容易被逻辑化，现实差异更容易被转译为裂隙显现的不同方式。

(三) 否定性的结构化及其辩证法含义

否定性在齐泽克那里不是过渡环节，而是一种常态。否定性没有通向综合，反而会阻止秩序完成自我封闭。主体的行动能力来自裂隙持续的存在，而不是来自裂隙被克服。这种否定性理解，可以说确实保留了辩证法的激进锋芒。它避免把辩证法降格为调和论或经验主义式的发展逻辑，也避免了把矛盾当作可被管理的功能性变量。否定性的结构化不仅改变辩证法的方向性，也改变辩证法的论证方式。经典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往往需要通过具体历史内容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来证明其解释力，否定性结构化则更依赖形式显示。只要能够显示秩序是无法封闭的，就能证明否定性的普遍性，辩证法由此更容易获得自洽性。这种自洽性并非虚构，它建立在裂隙结构的严密性之上，但它也会在方法论上产生一种风险。当分析重心转向对失败的反复确认时，失败的生成过程本身往往缺乏展开。否定性被作为结构条件加以固定，也影响了辩证法的解释对象。社会冲突与制度危机更多被纳入象征秩序失效的框架之中，而较少回

到具体社会关系的形成机制。实在界与否定性在此提供了批判的力量，但也可能使现实对象主要承担展示否定性的功能([5], p. 42)。在对象分析层面，这种风险往往表现为深度的偏离。越是强调实在界与裂隙的不可整合性，越容易把具体对象当作否定性结构的展示场，从而削弱对对象内部结构关系的说明。这一点在艺术批评与文化分析中更容易看见。实在界作为批判的强有力资源确实能够提升解释的穿透力，但也可能把对象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压缩为符号秩序失败的注脚([5], p. 43)。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精神分析化绝非局部修补，而是把辩证法的问题域从社会历史机制转向主体裂隙与秩序失败的结构经验。辩证法仍然激进，但它更像一种对结构不可能性的表达。唯物主义在其中是否仍然成立，则取决于接下来的问题，即齐泽克如何给出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定义。

3. 精神分析化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

(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性：从实体到空洞

齐泽克自诩为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关键不在回到传统实体论意义的物质第一性，而在于把物质性重新定位为裂隙、空洞、回溯性规定的结构条件。物质性不再等同于可直观的对象，而等同于象征秩序无法覆盖的剩余与失败。视差辩证法在这里承担着限定的功能。唯物主义不是说要现实当作现成对象去占有，而是要承认现实总以不可整合性出现，并在这种不可整合性中定位主体与秩序的关系([4], p. 50)。近代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往往将物质视作客观存在的实体，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归结为物质形态的演变。当代精神分析取向的辩证法对物质性的理解发生了深刻转变。物质不再被视为可感知的实体本原，更像是一种缺席或空无所体现的根本性契机。在拉康开创的精神分析路径上，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物质的定义。阿尔都塞早年关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其著作中大量借用“多元决定”、“症状式阅读”等拉康式的概念，可见拉康的思想为辩证唯物主义注入了新活力。此后产生的新辩证唯物主义思潮主张物质性不应拘泥于具体的实体存在，而要关注那潜藏于实体背后的空洞本质。比如梅亚苏明确指出，物质是一种绝对的偶然性。换言之，世界的物质基质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实体，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无之虚，其中孕育着打破既定观念的可能契机。这种观点表明，当代辩证唯物主义者试图将物质概念从传统实体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而强调其内在的非实体性和不确定性，使唯物主义在反思自身基础时获得新的视野和深度。这种物质性理解具有反观念论倾向。它拒绝把观念当作自足起点，也拒绝把主体当作透明中心。裂隙不是主观经验的偶然内容，而是秩序的客观界限。唯物主义由此被重新定义为对界限真实的坚持。伴随着物质概念的这一转换，辩证唯物主义的某种空洞化特征日益凸显。拉康和其后的一些思想家(如齐泽克)强调，实在界作为真正的物质性，并非任何具体可感的事物，而是一个经由否定性定义的裂隙或缺失。齐泽克借用物理学中的真空现象进行类比，用来强调空洞/缺失在其物质性理解中的地位。在一个密闭容器中抽空所有空气后，经验直觉会把它理解为“空”。在自然科学语境中，关于“真空”的讨论往往并不等同于绝对的无。相关理论指出，所谓真空态仍然涉及某些不可直观把握的物理条件。这里的说法仅作为一种说明性的类比，并不构成哲学本体论的论证前提。这表明，物质性在这里并不以实体的充盈来界定，更接近一种由缺失与不可封闭性所标记的现实性。所谓“空洞”指向的是秩序无法自足的条件，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能量场。对缺失与空洞的强调，使精神分析化的辩证法把物质性理解为不可被符号秩序完全涵盖的剩余，并将否定性放置在这一剩余的显现方式之中。现实的本质绝非实体性的充实圆满，而是在永恒流动的否定性裂缝中生成变化。唯物主义不应局限于承认可见之物的存在，还必须直面看不见之物及其产生作用的方式。沿着这一思路，当代学者能够在辩证法中进一步探究少于无的奥秘，将唯物主义推进到新的深度。可以说，从实体到空洞的理念重塑了唯物论的自我理解。这时的物质不再是凝固不变的客观，而是一种包含缺失的动态过程，赋予辩证唯物主义以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 反观念论的强化与对象性弱化：界限优先的代价

在精神分析化的辩证法框架中，反观念论构成重要理论取向。现实并不被视为可被意义充分吸纳的对象，主体也不再以同一性结构出现，而是呈现为内在断裂的存在形式。它迫使意识形态批判不再依赖简单的揭露 - 还原模型，而进入更复杂的幻象与症候机制分析([3], p. 121)。与物质概念的转向相伴随，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立场上表现出更为坚决的反观念论倾向，即对唯心主义和先验观念的更彻底批判。一方面，当代哲学家直面传统认识论中的相关主义难题。我们对客观物的认知始终受主观观念所中介，如果不突破这种主客相关框架，唯物主义就难免流于伪唯物主义。梅亚苏等人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隐秘唯心倾向称作相关主义，认为必须打破人类意识与存在之间那种不可超越的关联。真正的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设想在无任何意识介入的情况下，物自身的存在及运动规律。这种主张强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观念决定论的立场，使唯物主义哲学回到以物质本身为起点的道路上。然而，要彻底摆脱观念对哲学的羁绊，新唯物主义者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径。他们没有简单宣称某种客观实体高于意识，相反，他们通过揭示现实中不可被意识所吞没的剩余、断裂，来凸显思想无法主宰存在的坚硬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新一代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唯心论的反驳更进了一步，其批判锋芒直指任何试图以观念、意义来封闭世界的不自洽之处。困难就在于，界限优先的语法容易使现实对象的结构机制退居其次。现实以其不可整合性出现，理论更擅长揭示秩序为何失败，却未必同样擅长解释失败如何被生产出来。当社会关系主要以症候形式进入解释时，生产方式、制度机制与阶级关系的分析往往难以充分展开。齐泽克对物质性的理解，建立在其逻辑立场的转换之上。由普遍性逻辑转向“非全逻辑”，使物质性不再被理解为可以被观念直接反映的对象，避免了反映论对现实的简化处理。但在这一转换中，物质性同时被置于高度抽象的逻辑结构之内，现实历史对象在解释中的位置随之被弱化，辩证法对具体社会关系的说明也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这种激进的反唯心立场也带来了对对象性的弱化。也就是说，在极力排除一切先验观念和主观投射之后，传统意义上清晰稳定的对象概念本身受到了质疑。在拉康 - 齐泽克式的理论视野中，我们平常所谓的对象其实是经由语言和概念构造的产物。当我们用石头、树木或任何名称指称某物时，已将混沌的存在切割为符合概念的对象，因而这些对象从来都不是纯粹独立于意识的原物。在自然世界中不存在预先命名好的对象，物这个术语本身即是一种观念建构；通过概念化赋予某种存在以物的属性，实际上是意识对无差别实在施加的分类。换言之，对象性在诞生之时便打上了观念的烙印。因此，新辩证唯物主义者宁可谈论某种无法被符号完全同化的实在剩余，也不愿意轻易承认有一个不经意识的筛选便自明的绝对对象存在。在他们看来，凡是进入我们知识和感知体系的对象，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人类的意义形式；客观世界中总有部分实在超出我们的概念框架，作为不可化约的他者而存在。例如，当我们的理论试图整体把握复杂纷纭的现实，总会有某些扭曲、混乱的因素无法纳入既有范畴，只能以残余物的形式显示其存在。这表明，在反观念论的持续影响下，唯物主义哲学对对象性的执着有所松动。传统哲学追求知识与对象的完全对应，而精神分析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承认任何知识体系都不可能穷尽真实的实在。对象性被弱化并非意味着否认客观存在本身，而是强调对象的不可完满性，即每一个被意识捕捉的对象背后，都隐藏着未被概念吸收的剩余真实。这种认识促使唯物主义从简单的对象镜像论走向更自觉的批判。它不再把对象视为封闭自足的既定之物，而是注目于对象被认识所遗留、遮蔽的维度，在主客体关系中为不可化约的真实留下空间。换句话说，反观念论并不自动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对象性。对象性不仅是承认界限，更是对社会结构机制作出可追踪的解释。齐泽克的物质性如果主要以裂隙与空洞呈现，就必然会遇到对象性尺度的检验。

(三) 对实践的偏离：行动从中介机制变成裂隙效应

历史唯物主义将实践置于理论的关键位置。实践作为连接现实的中介，使主体、对象、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能够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被把握。通过实践，矛盾的展开不再停留于抽象结构的描述，获得了可

供分析的进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始终以历史科学为取向，在理论中不断要求分析向具体层面推进，以此限制辩证法的抽象化倾向([6], p. 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被赋予了方法论地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p. 136)。”这一命题确立了实践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功能，也为唯物主义规定了历史取向。当辩证法在精神分析框架中被重新表述时，实践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随之面临重新界定的问题。20世纪中叶，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结构主义路线重振马克思唯物论，但由于其理论中人为地排除了能动的主体维度，最终陷入了无主体的困境。实践主体的缺席，使得唯物主义方法在解释社会历史时丧失了原有的动力源和立足点。接踵而来的当代激进思想家(如巴迪欧、齐泽克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倾向。他们为唯物主义注入新观念、新方法的同时，也弱化了传统上由主体实践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一转变体现为实践范畴的一种“漂移”，即从原本决定理论走向的中心要素，逐渐滑移到理论结构的边缘或隐含位置上。精神分析化辩证法没有排除行动，行动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打断常态秩序的介入。它通过触发象征秩序的失效，使主体位置发生突变，由此打开对既有现实的重新书写可能。唯物主义的否定性如果离开对象性活动，就会重新落入抽象目的论或结构主义循环，这一点在对否定之否定的当代讨论中已有清晰辨析。唯物主义的否定性以现实的对象性活动的人为主体和前提，实践目的论的有限性正是其区别于黑格尔绝对目的论的关键([8], p. 22)。以巴迪欧为例，他继承了阿尔都塞对物质偶然性和断裂的重视，运用数学本体论构建出一种新唯物主义图景。然而，由于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巴迪欧的理论虽然赋予唯物主义新的活力，却未能真正解决先前的问题，反而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在巴迪欧的事件理论中，唯物主义主要通过对象与结构的抽象规定展开。事件被置于既有结构之外加以理解，而实践并未构成理论展开的内在环节。这种处理方式在形式上保持了对观念论的拒斥，但也使理论更多依赖概念自身的运作，现实历史对象在解释中的位置趋于弱化。齐泽克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主要通过否定性概念展开。裂隙、空洞与界限被置于理论结构的中心位置，用以巩固其反观念论立场。在这个框架中，现实不再被理解为可以被意义体系完全统摄的对象，主体也不以自我同一为前提而成立。与此同时，解释重心持续停留在结构性否定层面，使现实历史对象在分析中的优先性逐渐被削弱，实践在理论中的中介功能也不再得到充分展开。唯物主义在这里更多依赖否定性结构的自洽运作，其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对象规定性和实践取向之间，由此形成需要进一步辨析的距离，这在齐泽克的整体理论形态中表现得较为集中。他明确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称，但他的论证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主体结构与否定性机制展开，对现实历史过程中的实践路径、组织形式与关系结构的分析相对有限。即便在涉及政治与社会议题时，具体对象也往往被纳入否定性结构之中，解释重心倾向于回溯至象征秩序的裂隙与主体分裂的运作逻辑。由此，辩证法在形式上保持批判锋芒，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所强调的实践中介与历史科学取向，则容易被压缩在概念分析的层面。实际上，齐泽克的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先验的主观辩证法。他通过拉康精神分析和黑格尔否定性来解释现实，将重点放在揭示社会秩序中的裂隙与幻象上，却较少涉及如何通过集体实践来改变这些现实裂隙。在齐泽克看来，提供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与其理论初衷相背的。他使用“革命”这一表述时，更多是一种对现实符号结构的颠覆式解读和对主体位置的激进转换，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清晰的社会实践策略。这种立场虽体现了理论上的彻底性，但也导致实践维度相对隐退，即实践不再作为明确的理论出发点出现，而是退居为对裂隙与剩余的自我领悟、对意识形态幻象的内在瓦解。实践位置的偏离意味着在精神分析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实践不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理论的直接归宿，反而以一种潜在背景或未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于理论之中。实践维度的弱化会改变唯物主义的论证方式，否定性更容易作为通用资源被使用，而行动如何进入社会关系的变动过程就缺少了展开空间。这一点恰好构成对精神分析化辩证法方法论有效性的关键检验。

4.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检验

(一) 对象优先性：社会结构的第一层规定能否保留

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现实问题时，始终以现实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与历史规定性为理论出发点。现实被理解为具体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并展开的社会关系总体。从这个立场看，对象优先性不是要否认现实中的断裂与界限，而是要强调社会关系本身具有可分析的生成机制。现实能够进入理论分析，首先是以生产方式及其再生产结构的形态被把握。围绕这个问题，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话语向物质生产话语的转向。在《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等文本中，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秩序被系统纳入考察，理论分析的重心也由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转向对现实生产机制的具体研究。物质生产活动由此不只是经验层面的对象，构成了理解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基本环节。这一转向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取向，即通过对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结构的分析，把社会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历史展开过程具体化([9], p. 7)。现实对象进入理论时，首先以社会关系的结构层次出现。生产与再生产机制、阶级关系、制度安排、劳动组织方式共同构成对象的第一层规定。裂隙与失败当然存在，也可能成为对象的重要表现，但它们不能替代结构规定本身。把物质生产话语的发生学转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资源就意味着，理论必须追索对象如何被生产出来、如何被再生产、如何在制度层面维持其稳定性与危机形式。如此看齐泽克的辩证法思想，关键就不在于其是否承认裂隙真实，而在于社会结构是否仍以第一层规定进入理论之中。资本、劳动关系、制度安排、阶级结构、再生产机制能否被当作矛盾生成的起点，而不仅仅只是裂隙展示的舞台。如果社会矛盾主要被解释为象征秩序失败的症候，社会结构就难以作为第一层规定被保留。这种理论能够解释为何总失败，却不容易解释失败如何被生产。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抽象化，即抽象缺少机制说明。精神分析化辩证法所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现实在理论中的规定方式。现实在通过界限与裂隙进入分析时，对象规定容易滑向形式层面的处理。对象之间的差异被压缩为裂隙形态的差异，社会结构的生成与运作机制在解释中让位于否定性结构的展示。在这种处理下，关于秩序无法实现封闭的判断能够得到反复确认，而秩序形成、维持及其再生产过程却缺乏展开。因此，对象性层面的检验就非常明确了。裂隙构成对象分析的一个维度，但不足以穷尽对象本身；否定性参与解释过程，但不能同时占据解释的起点与终点。

(二) 历史机制：否定性结构能否替代历史解释

否定性结构化的优势在于抵制连续进步叙事，使辩证法保持对总体化的警惕。不足之处在于，它容易把历史差异压缩为同一结构的反复显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不是事件性的叙事技巧，而是机制性的解释要求。如社会结构如何在矛盾运动中发生转化？转化通过哪些中介实现？哪些条件使矛盾尖锐化或被吸纳？历史唯物主义若不持续推进具体化，就会退化为抽象哲学立场，这也是再具体化命题所针对的核心问题([6], p. 2)。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何发生。机制性地说明要求给出结构链条，矛盾如何生成、如何累积、如何在制度层面转化为危机形态，危机如何在阶级力量与实践中介作用下走向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解释不拒斥断裂，但断裂需要被嵌入结构机制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要求再具体化，正是因为抽象的否定性语言会在缺少机制说明时迅速扩张为普遍模板。齐泽克的回溯性叙述把历史理解为不断重写自身的断裂过程，这种视角能揭示意识形态的缝合机制与主体的回溯性认同，却难以替代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历史机制在这里容易被结构不可能性吸收。矛盾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特定结构条件产生了对抗，而是因为秩序必然失败。历史解释一旦落入这一语法，理论就更像哲学诊断，而不是历史科学的说明。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强调回溯性与事件性，能有效拒斥线性进步叙事，却也更容易以不可能性来取代机制说明。在这种处理方式下，历史被主要处理为断裂性事件的排列，结构性运动的分析趋于弱化。否定性结构可以揭示历史秩序的不封闭状态，却不足以独立承担对历史运动具体路径的说明。历史运动的分析仍需通过社会结构关系的考察，并借助实践作为中介环节，

才能获得具有历史科学意义的解释。

(三) 实践与政治：裂隙的爆发与变革的中介

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以“事件”、“短路”、“破裂”描述行动的发生条件。这种描述能够抓住行动的非连续性与突发性，也能批判改良主义的管理逻辑。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重心，始终指向的是行动如何进入并改变既有社会结构。行动不以孤立事件的形式发生，而在组织形态、制度安排与阶级力量的动员过程中获得其历史效力。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再组织，是在这些中介环节中被推进并不断具体化。如果缺少相应的中介，行动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的断裂经验之中，难以被纳入历史过程的解释框架。因此，实践中介的意义不在于将政治简化为组织或技术问题，而在于将行动置入现实的结构关系之中，使其能够作为历史力量的一部分加以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主义的否定性绝非抽象结构的自我展开，而是依托于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否定。否定性之所以具有历史效力，取决于运动主体在现实关系中的形成与展开。同样，目的论也不指向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而是在具体实践中，以有限目的与既定历史条件的结合方式得以确立[8], p. 23)。

这不是说回到粗糙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要求恢复实践作为中介的地位。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实践给现实世界赋予了真正的辩证本性，使辩证法不再只是思维运动，而是现实运动的理论把握[2], p. 22)。同样，唯物主义的否定性之所以成立，在于运动主体被转换为现实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否定性具有有限的实践目的论指向。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在反观念论层面呈现出唯物主义取向。裂隙被理解为真实存在，意义的总体化倾向受到限制，这有效避免了观念论对现实的封闭解释。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问题随之转向裂隙的定位方式。裂隙若停留于结构层面的自足运作，否定性容易被提升为通用解释框架；裂隙被置入社会结构关系与实践中介之中，其解释功能才能获得具体限定，并与历史过程的分析保持一致。否则，它更接近一种消极唯物主义。否定性强，机制说明就弱；批判力度足，历史解释就不足。精神分析化辩证法通常以事件性发生来理解行动，将行动把握为对既有秩序的非连续性介入。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突出行动对常态结构的中断效应，也强化了对秩序自足性的否定性批判。然而，当行动的分析缺乏社会结构与制度机制的中介时，其解释重心容易停留在裂隙经验的显现上，行动被呈现为一种突发性的否定时刻，难以被纳入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中。在实践尺度中，行动的理论效力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说明为对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介入，是否能够被理解为对既有结构规定的现实改写，而不仅是对秩序失效状态的再度确认。缺少这一层次的说明，否定性虽保持其批判强度，却难以转化为历史运动的解释资源，理论分析也随之停留在对断裂的反复指认之中。

总体来看，精神分析化辩证法仍然可能是唯物主义的，但前提已经发生变化。因为唯物主义不只意味着反观念论，也意味着对象优先性、实践中介与历史机制解释的统一。齐泽克以裂隙与空洞重写物质性，在反观念论意义上强化了辩证法的批判锋芒；同时，这一路径也更容易把现实社会关系转译为秩序失败的症候，从而削弱对结构生成机制与历史转化路径的说明能力。精神分析化辩证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一致，归根到底取决于否定性在理论中的使用方式。若裂隙主要停留在哲学规定之中，否定性被当作通用解释资源，行动仅被把握为事件性的经验时刻，那么相关分析就容易停留在对秩序失效的描述，而难以进入对社会关系变动过程的说明。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区分，意在澄清一种方法论界线。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旨在明确判断唯物主义时所依凭的分析前提。否定性只有进入对现实社会关系变动过程的说明，才具有可检验的理论效力。

参考文献

- [1] 孔明安, 谭勇. 从普遍性逻辑到非全逻辑的转换及其困境——兼论齐泽克对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批评及其不足[J]. 学术界, 2022(2): 121-129.

- [2] 贺来. 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变革意蕴[J]. 哲学研究, 2020(7): 20-29.
- [3] 孔明安, 谭勇. 分裂·幻象·驱力——论齐泽克精神分析视域下主体的三个维度[J]. 哲学分析, 2021, 12(3): 120-131.
- [4] 李西祥. 论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49-57.
- [5] 陈林侠. 实在界真的那么重要吗?——齐泽克电影批评的反思[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1): 42-53.
- [6] 包大为. 作为时代任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具体化” [J]. 现代哲学, 2021(3): 1-9.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第三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王南湜.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325(7): 22-33.
- [9] 张一兵. 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转换的经济学背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J]. 哲学研究, 2021(12): 14-24.